

葡萄牙人的亞洲貿易網絡與阿瑜陀耶

岡美穗子* 著，沈藝** 譯

摘要 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征服馬六甲，這是亞洲貿易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事件，為葡萄牙人進入利潤豐厚的亞洲貿易網絡打開了大門。馬六甲原本附屬於阿瑜陀耶王朝，在鄭和下西洋之後尋求獨立，因而與阿瑜陀耶關係緊張，但在這些衝突之外，雙方的貿易（主要圍繞阿瑜陀耶的大米和馬六甲周邊地區各種商品）一直持續不斷，甚至在葡萄牙人干涉馬六甲事務之前也是如此。阿瑜陀耶逐漸成為馬六甲—中國貿易路線上的一個重要港口，促進了香料及其他各種貨物向中國的輸出。此外，日本與阿瑜陀耶的貿易也蓬勃發展，有證據表明，雙方的貿易開始於十六世紀中期。日本封建領主大友宗麟和平戶松浦氏參與了對阿瑜陀耶的貿易，其中總會出現作為中間人的葡萄牙人的身影。這些被記載於歷史記錄和報告中的互動，凸顯了整個十六世紀涵蓋馬六甲、阿瑜陀耶和日本的複雜的貿易網絡，也塑造了東亞及東南亞的社會經濟格局。

關鍵詞 “已婚者”；阿瑜陀耶的葡萄牙僱傭兵；泰日貿易；蘭代羅；葡萄牙人亞洲貿易網絡

引言

儘管人們一直隱約地意識到，在葡萄牙人的亞洲貿易網絡中，港口城市阿瑜陀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至今仍缺乏關於此課題的先行研究。究其原因，一是長期存在這樣的刻板印象，即葡萄牙人與阿瑜陀耶的貿易是在印度總督領導下的葡屬印度（Estado da Índia）的管理下開展的；二是因為在阿瑜陀耶這樣確立了王權的亞洲港口城市定居，並在當地政權管理下進行貿易的葡萄牙人群體的實際情況並不清晰。

然而，筆者在考察葡萄牙人的亞洲貿易時發現，這些定居在當地的葡萄牙人（下文稱“當地定居型葡人”）才是進行貿易活動的主角，其活動為後來抵達亞洲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業活動奠定了基礎，這些事實有必要被人們重新認識。¹ 本文基於此種認識，聚焦於以往因史料不足而難以明確整體形象的當地定居型葡人的活動，試圖探明作為聯結東南亞與東亞商業網絡的重要據點的港口城市阿瑜陀耶在十六至十七世紀的貿易狀況。²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由於本文論及廣域範圍內的事件與現象，因此文中出現的年份日期均統一為公曆。

一、葡萄牙商船在亞洲各地間的貿易

對於日本人而言，“南蠻貿易”一詞早已耳熟能詳。這個詞語給人的印象，通常是通過遠洋航海從歐洲和印度運來的珍奇物品。實際上，在這種貿易中被運至日本的主要商品是以

* 岡美穗子，京都大學人類環境學博士，曾在里斯本新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現任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南蠻貿易、中近世海域史。

** 沈藝，北京外國語大學文學碩士，現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副社長，主要從事東亞歷史和海外中國學的翻譯、編輯和出版工作。



圖 1. 南蠻屏風，約十七世紀上半葉。（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65417>。）

生絲為代表的中國產品，如屏風所描繪的那種充滿異域風情的舶來品，只是作為進獻等特殊用途的例外而已。在探討葡萄牙人的亞洲貿易時，有必要將其分為歐亞間貿易與亞洲各地間貿易兩大類，而在中日兩國間進行的“南蠻貿易”，是葡萄牙人在亞洲各地之間進行貿易時的一條基本路徑。

進行歐亞間貿易的船隻，通常在每年 4 月從里斯本啟航，然後經非洲沿岸南下，繞過好望角，在莫桑比克的港口過冬，等待橫渡印度洋的季風；之後，他們再橫渡印度洋，大約在 9 月抵達印度馬拉巴爾海岸的果阿或科欽。如果在果阿或科欽能夠購得足夠的香辛料或中國陶瓷器等面向歐洲出口的亞洲商品，那麼貿易船隻就會停靠在當地，直到 12 月至次年 1 月間再次起航返回里斯本。此外，也有船隻選擇直接航行至馬六甲購買香辛料和中國陶瓷器；或者航向摩鹿加群島，進行肉豆蔻（nutmeg）和肉豆蔻乾皮（mace）等群島特產交易；更有甚者，少數船隻還會前往澳門，再從澳門航行至日本。換句話說，即使是進行歐亞間貿易的船隻，也有可能直接參與亞洲各地間的貿易活動，但這種情況實屬例外。

至於亞洲各地間貿易，主要是由定居亞洲的葡萄牙人來進行。這些葡萄牙人中，有的居住在商品集散地如馬六甲或澳門，有的則居住在靠近生產地的港口城市，將各種商品運往集散地。這種當地定居型葡人被稱作“已婚者”（casado）。他們活動在葡萄牙王國的管轄範圍外，一方面在亞洲各地的港口定居，以從事貿易活動為生；另一方面，他們與當地女性或自己的女奴隸組建家庭，逐漸融入當地社會。這些“已婚者”（及其後代）尤其集中的地方有：面朝孟加拉灣的諸王國、阿瑜陀耶、澳門。他們以亞洲的葡人聚居地為據點，不斷拓展各自的交易網絡。到了十七世紀下半葉，他們開始轉變角色，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網絡中，充當起公司與當地社會的中間人，並因此為人所知。

大約在 1540 年以後，在以馬六甲為據點的葡萄牙商船的活動中，以“已婚者”為中心的私貿商人開始嶄露頭角。其背景是，隨着中國沿海地區倭寇勢力的不斷增強及其活動的日益頻繁，葡人得以與之開展中國商品貿易。當初，以馬六甲為據點前往東南亞各地港口城市的小型商船航行，是由葡萄牙國王或印度副王

海外文獻中的澳門史

授權給馬六甲總督，再由馬六甲總督任命前往各地區的“甲必丹末”（Capitão-mor，船隊總指揮）來進行的。然而，這種航海權逐漸變成可以買賣的權利，本來沒有航海權的商人購買權利後，便可率領船隊從事貿易。雖然馬六甲總督有很多獲得航海權的商業渠道，³但以往基本沒有馬六甲總督親自率船航海的事例。在1585年印度副王授予馬六甲總督的許可狀中，馬六甲總督的裁量權得到了確認：除了國王擁有優先壟斷權的地區（日本、中國、摩鹿加群島、班達群島）以外，馬六甲總督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轉讓前往其他地域的航海權。⁴

1557年前後，葡萄牙人被允許在廣州沿海的澳門地區定居。隨後，私貿商人紛紛聚集此處，開始從事與日本和東南亞各地的貿易。從印度和馬六甲移居到澳門從事貿易的“已婚者”也隨之劇增，使得澳門葡萄牙人口中的一大部分都是這種“已婚者”。無論是否擁有航海權，有資金的人都能買來船隻（通常為中國戎克船）親自進行貿易。就明確已知的範圍而言，這些澳門私貿商人所支撐的商業路徑包括：日本、阿瑜陀耶、占婆、東京、北大年、柬埔寨、馬拉巴爾海岸、帝汶島、菲律賓群島、蒂多雷島、面朝孟加拉灣的白古及其他港口城市，以及巽他群島等。⁵其中，由於1580年將葡萄牙納入其統治之下的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的禁止，與菲律賓群島的貿易反而成為私貿商人特別活躍的一條路徑。

1570年以降，通過這條貿易路徑，由蓋倫帆船從新大陸運到馬尼拉的白銀，經由福建海商和澳門商人之手，大量流入中國境內。廣州根據每年船隻出港的時期開設互市：面向日本的互市在4月至6月開放（船隻於6月至7月出港），面向印度的互市在9月至10月開放（船隻於12月至次年1月出港）。⁶一份據推測寫於十六世紀末的史料詳細記載了在廣州和澳門進行交易的情況，其中列舉的中國產品有辰砂、銅、真鍮⁷、水銀、鐵等金屬，而鉛則被明確記錄為產自暹羅。⁸甲必丹末的船隻將暹羅出產的鉛從澳門運至日本，每年運輸的數量約2,000

擔（約等於12噸）。鉛是南蠻貿易中日本進口的重要商品，基本上可認為這些鉛是私貿船隻從阿瑜陀耶運到澳門中轉，再運至日本的。

二、十六世紀的阿瑜陀耶與葡萄牙人

（一）十六世紀上半葉的阿瑜陀耶

葡萄牙人在阿瑜陀耶的貿易活動始於1511年，當時征服了馬六甲的阿豐索·德·阿爾布開克（Afonso de Albuquerque）派遣杜阿爾特·費爾南德斯（Duarte Fernandes）作為大使，與出入馬六甲的華人海商一起前往阿瑜陀耶宮廷。⁹此後，從事馬六甲與中國間貿易的葡萄牙私貿商人還是經常停留在阿瑜陀耶港口，在當地中轉商品、修理船舶和招募水手等。¹⁰另外，從以下記錄可知，葡萄牙人搭乘前往日本和中國沿海地區從事貿易的華人船隻的現象，在大多數情況下可能都是發生在阿瑜陀耶：

1542年，迪奧戈·德·弗雷塔斯（Diogo de Freitas）作為一艘船的船長在暹羅國的Udià市[即阿瑜陀耶]停留期間，有三個葡萄牙人離開了隊伍，並搭乘前往中國的戎克船逃走了。他們的名字分別是：安東尼奧·達·莫塔（António da Mota）、弗朗西斯科·澤伊莫托（Francisco Zeimoto）和安東尼奧·佩肖托（António Pexoto）。他們本來想要停靠在北緯約30度的寧波港，但在航行途中，因船尾受到突如其來的大風影響，船隻被吹離岸邊。向東漂流了數日後，他們在北緯32度附近發現了一座島。這座島似乎就是被稱為“日本”的地方，很多書裡都曾提及那裡的富裕，這似乎就是那個“日本”。¹¹

這段文字一直以來被認為是葡萄牙方面關於葡萄牙人漂流到種子島的情報，是安東尼奧·加爾旺（António Galvão）的《新舊發現記》（*Tratado dos Descobrimentos*）中的一節。可以認為，1542年乘坐駛往寧波（確切地說是

浙江省沿岸的雙嶼和六橫島)的華人海商船隻出發，但被突如其來的暴風吹至日本沿海地區的三個葡萄牙人，應該就是停留在阿瑜陀耶的葡萄牙商船的船組人員。有人認為，加爾旺的這段記錄與《鐵炮記》中關於1543年乘坐倭寇首領王直的船隻抵達種子島的葡萄牙人的內容相似，故而以往這兩段記錄被認為是關於同一事件的；然而，近年有觀點認為，兩者間存在的事件差異並非單純的筆誤，實際上可能指的是兩批不同的人。支持“一致說”的學者則提出，王直帶着葡萄牙人抵達日本的交易範圍也包括暹羅。由此可見，在考慮這個時代的貿易背景時，“阿瑜陀耶”是一個關鍵詞。

另外，根據高瀨弘一郎譯註的《大航海時代的日本》所載的史料，我們可以明確知道安東尼奧·佩肖托後來的消息：1569年，佩肖托在印度西海岸與穆斯林戰鬥時身亡，未能行使之前被授予的在中國與巽他群島間的商業航海權，隨後這一權利獲允轉讓給佩肖托的妻子。¹²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 (Fernão Mendes Pinto) 曾在《遠遊記》(Peregrinação) 中寫道：

與我一起從巽他群島來的兩個人借給我100克魯扎多。我計劃用這筆錢進行投資，並與六七位葡萄牙人一同前往日本。我在這個城市 [指阿瑜陀耶] 等待前往中國的航海期，至今已經一個月了……¹³

由此可見，華人海商頻繁往來於阿瑜陀耶—中國沿海地區—日本的這條航線上，搭乘這些商船的葡萄牙人也屬於不特定的多數。沙勿略在前往日本途中，曾在1549年6月20日從馬六甲寫給果阿耶穌會士的書信中說：“根據從日本回到暹羅的人寫給我的信……”¹⁴ 這說明去往日本的葡萄牙人在暹羅停留是很平常的事情。因此，上文提到的分別於1542年和1543年前往日本的葡萄牙人，不一定是指同一批人。

華人海商與海寇自古以來就在這條通路上往來，葡萄牙人也從十六世紀四十年代開始直接參與進來。十六世紀上半葉，暹羅與緬甸等國為爭奪東南亞大陸部分的霸權而陷入了激戰，葡萄牙人通過提供歐洲火器等新銳軍備來換取在諸港口進行交易的便利。因此可以認為，葡萄牙人剛到種子島時，為了引起領主的注意而宣揚其鐵炮的厲害之處，也是基於他們在東南亞的經驗。

根據平托的《遠遊記》，1547年前後有130名葡萄牙人逗留在阿瑜陀耶。¹⁵ 當時正值阿瑜陀耶國王帕拉猜 (Chairacha)¹⁶ 遠征清邁的蘭那泰政權之際，葡萄牙人提供了炮兵和火器等軍事支援。作為回報，他們獲得了在阿瑜陀耶王國內各港口免除關稅的特權，以及在阿瑜陀耶建立葡萄牙人居住區的保證。¹⁷ 雖然平托的記述中有許多誇張之處和年代錯誤，作為史料來處理時需要注意，但《遠遊記》描述的1547年前後的泰緬戰爭、同一時期帕拉猜王的去世，繼承人被其母殺害的事件及王室後續的動亂，都與史實相符。平托在《遠遊記》中專闢一章來說明暹羅是資源豐富的國家，並詳細而具體地記載了林林總總的商品。

高處樹木成林，紅斑木數不勝數，足可以建造成千上萬艘各類船隻。有許多銀、鐵、鋼、鉛、錫、硝石和硫磺礦。此外，還盛產絲綢、沉香、安息香、火漆、靛青、棉布衣物、紅寶石、藍寶石、象牙和黃金。沿岸生長着大量蘇木和紫木。每年有一百多艘滿載這些木材的戎克船駛往中國的海南島和其他地方、琉球、柬埔寨和占城……¹⁸

平托認為，暹羅出產如此多種多樣的產品，是亞洲最重要的地區之一，隨後陳述了葡萄牙人征服此地的正當性。

(二) 迪奧戈·佩雷拉在阿瑜陀耶的活動

筆者曾在另外的文章¹⁹中專門討論過迪奧

海外文獻中的澳門史

戈·佩雷拉 (Diogo Pereira)，他領導的團體是十六世紀四十年代活躍在馬六甲至中國沿海地區的葡萄牙私貿海商網絡中最大的一股勢力。在朱納率領的明朝軍隊討伐走私貿易據點雙嶼的戰爭 (1548 至 1549 年間) 中，與其他海寇勢力一道被捕的“佛朗機”，其核心便是佩雷拉團體。佩雷拉及其船員於 1549 年停泊在阿瑜陀耶，受阿瑜陀耶國王摩訶·查克拉帕特 (Maha Chakkraphat) 委託，參加了抵抗緬甸軍隊的戰鬥，這一事件在迪奧戈·多·科托 (Diogo do Couto) 的《亞洲史》(Decadeas da Ásia)²⁰ 中有詳述。正如上文所述，葡萄牙人通過提供軍事支援來換取阿瑜陀耶的優待，可以說佩雷拉團體又是其中一例。下面要引用的文字雖然有些冗長，但考慮到科托的《亞洲史》在日本尚無譯本，因此翻譯出與阿瑜陀耶相關的主要部分予以介紹。

暹羅王國的第一都市 Odia (阿瑜陀耶) 位於臨近緬甸的地區，在沿河逆流而上 40 里格的地方，這條河被亞伯拉罕·奧特柳斯 (Abraham Ortelius)²¹ 稱為“Menaó” (昭披耶河)，在克勞狄烏斯·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aeus) 的地圖上寫作“Doris fluvium: 荒川”，其河口位於北緯 20 度左右。這是一條非常大的河，水深足以讓戎克船和我們的卡拉克帆船²² 直接駛入城鎮，河面有當地的半里格那麼寬。沿岸是鱗次櫛比的集落、村莊和農園，遍佈油棕和散尾葵的林子，還有印度地區常見的各種各樣的果樹園子。這裡盛產生薑，還有數不清的甘蔗，這些甘蔗可生產出大量砂糖。人們喝的是燒酒 (agua ardente) 一樣的蒸餾酒。沿河流前往上游，可見一些“Tabancas”，這是城鎮的入境登記處，類似稅關，人們在這裡繳納某些關稅和通行稅。像這樣的關口還有很多，有些是寺院，裡面裝潢十分奢華，從天井到柱子都用金箔裝飾，他們的聖職人員居住在此。這條河流在 6 月間泛濫，河水會流入其他河流，潤澤了這片土地。泛濫期間，

船隻由繩索牽引着前往上游。即便如此，也到處都是危險。[此處繼續描寫昭披耶河的泛濫，省略] 洪水期間，森林裡的所有動物，如鹿、印度鱷 (gavial，又叫食魚鱷)、老虎、水牛及其他種類的動物，都逃到地勢高的地方，於是暹羅人乘着眾多船隻出去打獵。他們在船上利用火繩槍、箭矢和棍棒等工具殺死動物，這是一種非常令人愉悅和振奮的狩獵活動。他們殺死的動物數量之多，使得很多戎克船將這些野獸的皮毛運到日本販賣。在日本，這些貨物十分有利可圖，因為日本人用這些皮毛製作服飾和其他手工藝品。同樣地，我們每天也目睹這些產品被運往印度。這些皮革可以被製成美麗的馬鞍 (caparazón) 和上下桅杆時抓握的索具 (bastarda)、皮袋子，以及其他珍奇之物。這些物品上還有十分精美的刺繡……如果要問阿瑜陀耶城鎮的規模有多大，恐怕沒有哪個葡萄牙人能夠給出真實的信息。因為他們不被允許自由地在街上漫步……緬甸國王設置了多個野營地，對 Odia 多地發動進攻。暹羅國王駐守在最有可能遭到侵略的地方 [河面最狹窄、河水最淺之處的要塞]。他不信任除葡萄牙人以外的任何人，讓他們待在要塞內，那裡大約有 50 名葡萄牙人，其中就有迪奧戈·佩雷拉，他和自己的卡拉克帆船此時都停留在當地，他被選為甲必丹末。他勇猛非凡，為了守衛要塞而奮戰，重創了白古人和緬甸人。當然，佔領這座城鎮並不是葡萄牙人的初衷。為甚麼這樣說？因為這個城市裡的人 [葡萄牙人] 並不是造就我們歷史的偉人，而是被我們置之不理的一群人……²³

從這段記錄中可知，即便在十六世紀上半葉，仍有戎克船從事日本與暹羅間的貿易，它們主要運送動物皮革等貨物。可以推測，這些貿易活動大概主要是由華人海商 (後期的倭寇) 來進行的。而且，根據記錄，他們循着商機而來

的時間正好是昭披耶河洪水泛濫、動物們都集中到高地的時期。

上文提到，緬甸國王攻打阿瑜陀耶的戰爭發生在1549年，這也是佩雷拉團體在中國沿海地區被明軍討伐的第二年。由此可知，佩雷拉在1548年率領三艘船從阿瑜陀耶駛向雙嶼，在雙嶼留下兩艘船和代理船長後，於明朝官兵討伐前離開，前往馬六甲。²⁴換言之，佩雷拉在從雙嶼返回馬六甲的途中，停靠在阿瑜陀耶，在此參加了與緬甸軍的作戰。科托詳細記錄了佩雷拉的女婿佩德羅·德·卡斯特羅（Pedro de Castro）的出身，關於佩雷拉本人卻隻字未提。由此我們可以認為，這或許表明佩雷拉的出身不明，他也許是在印度出人頭地的。正如科托所言，那些以阿瑜陀耶和中國沿海地區為據點活動的葡萄牙人與作為一個國家的葡萄牙幾乎沒有甚麼關係。

（三）十六世紀下半葉的阿瑜陀耶—澳門—日本貿易網絡

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門建立商業據點，阿瑜陀耶與澳門之間的轉運貿易由此展開。他們將生絲和陶瓷器等中國商品運往阿瑜陀耶，又將阿瑜陀耶的皮革、金屬和蘇木等產品運出。從澳門前往阿瑜陀耶的葡萄牙船隻，與前往望加錫、柬埔寨、東京、交趾支那和占城的船隻一樣，都是屬於私貿商人的個人商船。²⁵

在此之外，也有個別葡萄牙船隻不經過澳門，直接在暹羅與日本之間進行貿易。根據當時耶穌會日本副管區長加斯帕爾·科埃略（Gaspar Coelho）在1589年2月20日撰寫的報告，1587年有一艘從暹羅直接駛往日本進行貿易的葡萄牙私貿船漂流到五島列島：

從暹羅駛往日本的葡萄牙人的一艘戎克船，因遭遇暴風，突然闖入了諸島[五島列島]的一個港口。該島人煙稀少，沒有可托付之人，故而他們即刻向身處平戶的耶穌會副管區長送來書信，請求派

遣神父到他們那裡去。該島領主同意，在戎克船停泊在港口期間，允許神父們與他們一起待在島上。領主是出於與葡萄牙人通商的願望，才允許神父們待在他的領地上。²⁶

根據上述史料可知，這艘船被暴風吹到了五島列島。雖然其本來的目的地和所載貨物不明，但這個事例揭示了一點：即便在以澳門為中轉港口的暹羅—日本貿易繁榮之後，舊有的暹羅與日本間的直接貿易仍然有可能繼續存在。從這段史料可以看出，曾經的五島領主（五島純堯）對天主教的傳播比較寬容，但在他去世後，繼承領主之位的五島純玄卻對基督徒採取高壓政策，將傳教士驅逐出自己的領地。即便如此，他仍然歡迎葡萄牙人偶爾來到他的領地，並希望葡萄牙船隻能夠停靠自己的港口，為此甚至允許傳教士在領地內活動。

另外，雖然具體情況不甚明瞭，但在1563年，有從阿瑜陀耶駛來的葡萄牙船抵達了大村領地內的橫瀨浦。²⁷1565年，五島也有載着葡萄牙人的戎克船入港。²⁸

如前所述，阿瑜陀耶—中國—日本的航路，本來是華人海商利用的貿易路線，但在十六世紀中期，葡萄牙人也成功參與進來。本文開頭已經提到，除了甲必丹末的船隻外，私貿海商也在從事澳門與日本間的貿易。就中國（澳門）—日本貿易而言，在1610年以前，幾乎每年都有私貿商人的船隻航行到日本。²⁹

（四）蘭代羅家族

十六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往來於日本和澳門之間的私貿商人中，巴爾托洛梅烏·蘭代羅（Bartolomeu Landeiro）家族權勢顯赫。日本學界關於蘭代羅的研究，僅限於岡本良知先生的隻言片語，³⁰但近年來逐漸明確的是，這個家族的貿易網絡不僅囊括了暹羅和菲律賓，甚至擴展到了新大陸。³¹這個時代在亞洲海域活動的葡萄牙商人的經歷通常很難明確，

海外文獻中的澳門史

巴爾托洛梅烏·蘭代羅也不例外。他在1559年左右從里斯本前往果阿，在印度居住一段時間後，大約於1570年移居至澳門。

曾經有很多“改宗者”（*Converso*，又稱新基督徒、瑪拉諾）³²從伊比利亞半島遷徙到果阿，但1516年果阿也設置了宗教審判所，他們為了避免在宗教方面受到盤查，不得不再次逃往科欽、馬六甲、澳門等葡屬印度的官吏鞭長莫及的地方，這可以視作十六世紀六十年代澳門人口激增的背景之一。根據盧西奧·德·索薩（*Lúcio de Sousa*）的研究，蘭代羅家族就是改宗猶太人的可能性極高。³³十六至十七世紀活躍在亞洲海域的葡萄牙商人中有許多“改宗者”，這一點經常被高瀨弘一郎的研究提及，³⁴但從以下史料可以看出，“改宗者”尤其集中在澳門：

在中國有一個居住着600名同胞的集落〔指澳門〕……尤其令人震驚的是，那個集落裡有葡萄牙人向當地統治者懇求，希望能夠獲得用於舉行他們的儀式的房屋和土地。這是因為在我們居住的城鎮，如果沒有政府長官——海道副使的許可，任何人都不能修建屋舍。海道副使詢問為了信仰而請求修建房屋的是甚麼人。這並不值得我驚訝，讓我驚訝的是，那裡有超過300名新基督徒，他們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好基督徒”，甚至可以說，如果在葡萄牙或印度，他們每天都會因為異端信仰而遭受火刑。至少，我強烈反對讓這些人加入我們的會〔耶穌會〕，他們的父母兄弟說不定都曾在公眾面前被處以火刑。今年有一個叫作若熱·費爾南德斯（*Jorge Fernandes*）的人來到了當地〔指果阿〕，他父親的兄弟若昂·費爾南德斯·拉戈斯（*João Fernandes Lagos*）是個表面上皈依了天主教的傢伙，但已經被送上了刑場。他們〔新基督徒〕相互間關係和睦，哪怕是和神職人員也一樣，這實在出人意料。

[費爾南·梅內塞斯（*Fernam Menezes*）寫給耶穌會總長墨庫里安（*Mercurian*）的書信，1579年11月15日]³⁵

也就是說，在澳門，有身為非基督徒的葡萄牙人向廣東的海道副使申請修建宗教設施（可能是猶太教會堂？），這幾乎肯定地表明，澳門的“改宗者”在葡萄牙官方的耳目之外，再次改信猶太教了。

就目前明確所知的範圍而言，蘭代羅手下的葡萄牙人船長安德烈·費奧（*Andre Feio*）首次前往日本開展貿易是在1574年，其船隻在長崎停靠。雖然當時長崎已然面向外國人開港，但並不意味着所有葡萄牙船隻都會駛往長崎，至少在1576年、1579年、1580年和1582年，有葡萄牙船隻駛入了有馬領地的口之津。³⁶其中，1580年的那次是由巴爾托洛梅烏·蘭代羅親自作為船長，率領600噸位（當時最大噸位）的船隻而來。蘭代羅於1581年也曾帶領自己的船隻駛入了長崎，但不難看出，前一年他率船駛入口之津的這一舉動，與當地領主有馬鎮純（晴信）改信天主教有密切關係。

當時的有馬領地遭到龍造寺氏、西鄉氏和深堀氏等鄰近領主的攻擊。1571年，有馬鎮純在兄長去世後接任家督之位，尚且年少的他未能贏得家中所有勢力的支持，因而陷入內憂外患的境地。在這種狀況下，當時的日本耶穌會長、視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決定支援有馬鎮純，因為他是基督徒有馬義貞之子、大村純忠的侄子。但有馬鎮純因家中勢力的反對，尚未受洗。路易斯·弗洛伊斯（*Luís Fróis*）在《日本史》（*Historia de Iapam*）第2部第20章寫道：

視察員……決心向他們施以援手。因此，他命人購買大量糧食，每日施捨給來修道院乞討的窮人。不僅如此，他還下令救助被燒毀的城鎮，為其送去糧食，甚至廣施銀錢。為此目的，他還讓卡拉克帆船

送來充足的鉛與硝石。這些舉措讓他耗費了 600 克魯扎多。³⁷

可以認為，卡拉克帆船運往口之津的鉛與硝石都屬於軍備物資，即用於製造火繩槍的彈丸和火藥。關於這艘卡拉克帆船，岡本良知認為它是 1580 年駛入口之津的蘭代羅之船，而松田毅一卻認為它是 1579 年從澳門前往口之津的定期航船，該船的甲必丹末為萊昂內爾·德·布里托（Leonel de Brito）。³⁸

然而，如果閱讀上述記載的前一章內容，我們就會發現，范禮安向有馬鎮純承諾卡拉克帆船的來港後，後者為此改信了天主教。而上述描寫的是有馬鎮純受洗以後的事情，從時間前後來看，應是有馬鎮純先受洗（1580 年 3 月），然後才是范禮安命令葡萄牙船隻駛入口之津、帶來鉛與硝石。由此可知，范禮安用以提供鉛與硝石的船並非甲必丹末布里托的船，而是蘭代羅的船。另外，據其他史料可知，“有馬鎮純在蘭代羅的助力下躋身大領主之列”，³⁹即可認為有馬鎮純的入教與蘭代羅船隻提供武器、鉛和硝石等物品的關係極大。

這裡十分重要的一點是，耶穌會讓私貿船長蘭代羅（而非甲必丹末）提供用於支援有馬鎮純的軍備物資。換句話說，從這裡可以看出耶穌會與澳門巨商之間的紐帶。

根據索薩的研究，蘭代羅長期經營着製作大炮和火繩槍等火器的必要原材料的生意。⁴⁰而且，蘭代羅擁有的數艘海船都往返於澳門與東南亞之間從事貿易。

文森特·蘭代羅（Vincente Landeiro）向我們強調，前往澳門時必須支付貨物手續費和關稅。他還說，他無法在澳門接待我們，原因是他現在不在澳門。他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返回澳門後，他又為生意上的事情而航行至（摩鹿加群島的）蒂多雷島（Tidore）和暹羅了……

[巴勃羅·羅德里格斯（Pablo Rodrigues）從平戶寫給菲律賓總督的書信，1584 年 10 月 7 日]⁴¹

文森特·蘭代羅是巴爾托洛梅烏·蘭代羅的侄子，在其手下擔任船長。前一年，他為了貿易從澳門前往馬尼拉。在載着西班牙商人和傳教士返回澳門的途中，文森特的船隻遭遇海難，漂流到了平戶，他們受到了松浦鎮信的歡迎。上文引用的這段史料，就是搭乘文森特船隻的奧古斯丁會士寫給菲律賓總督的信件。由於平戶已經很久沒有葡萄牙船隻停靠了，所以這艘船的到來受到了歡迎。然而，由於澳門葡萄牙人之前與松浦氏發生的各種衝突（1561 年宮之前事件、1565 年福田港襲擊），松浦鎮信不再期望與葡萄牙船隻重開貿易，而是試圖通過文森特船隻的西班牙傳教士等人，尋求與馬尼拉通商。

雖然巴爾托洛梅烏有時會親自率船航行（如同 1580 年的口之津入港和翌年的長崎入港那樣），但一般情況下，澳門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是由他手下的多名船長負責的。由於文森特是巴爾托洛梅烏的親人，自然也可以認為，他作為巴爾托洛梅烏旗下船隻的船長四處航行。如上文史料所述，文森特從馬尼拉返回澳門後，很快又揚帆起航，奔赴摩鹿加群島和暹羅開展貿易。由此可以看出，蘭代羅家族的貿易網絡是以澳門為據點，將東南亞和日本聯繫在一起。考慮到蘭代羅家族的貿易網絡背景，我們可以推測，巴爾托洛梅烏在 1580 年運到口之津，以及翌年運到長崎的鉛，很可能都產自暹羅。或許可以說，能夠應范禮安的要求即刻準備好鉛和硝石的，除了網羅廣域貿易的、澳門數一數二的商人巴爾托洛梅烏·蘭代羅外，不作他想。

三、十七世紀的阿瑜陀耶葡萄牙人聚居區

進入十七世紀以後，日本人的朱印船，荷蘭、英國和法國的東印度公司，來自波斯的穆斯林商人，乃至以馬尼拉為據點的西班牙人等

海外文獻中的澳門史

各種勢力開始進入阿瑜陀耶，為獲得國王的信任和商品渠道而紛爭不斷。阿瑜陀耶歷任國王對葡萄牙人的商業活動的認識是，他們以澳門為據點，運來各種中國產品，這一點與中國人的戎克船如出一轍。然而，澳門的葡萄牙人與其說是作為一股歐洲勢力在阿瑜陀耶存在，不如說他們已宣誓絕對服從阿瑜陀耶國王的權威，並逐漸轉化為一個邊緣群體。

自拉瑪鐵菩提二世 (Ramathibodi II) 在位時的 1512 年開始通商以來，阿瑜陀耶與葡萄牙雙方的外交使節便在阿瑜陀耶和印度副王政府所在地果阿之間頻繁往來。1616 年，由多明我會士弗朗西斯科·德·阿農西亞桑 (Francisco de Anunciação) 作為大使從果阿出發的使團，雖然未能達成拜謁頌曇王的目標，但雙方交換了外交文書。其結果是，作為葡萄牙人提供軍事支援抵抗緬甸軍的回報，葡萄牙人在進行商業活動時免繳關稅的特權得到再次確認，其治外法權（葡萄牙人聚居區內的犯罪交由葡萄牙人首領／船長裁判）也得到保證，並且阿瑜陀耶承諾將持續不斷地向馬尼拉供應大米。⁴²

阿瑜陀耶的葡萄牙人社區是在當地政府的允許下建立起來的聚居區，除澳門和科欽之外，屬亞洲最大規模。這個葡萄牙人社區在當地被稱為“Bang Portugale”，位於昭披耶河畔的日本人町對岸。由於葡萄牙人與當地女性結婚或同居，這個社區不斷地混血化，但在當地出生的孩子都接受天主教洗禮，故而仍被視為葡萄牙人。據推測，那萊王時期著名的希臘人康斯坦丁·華爾康 (Constantine Phaulkon) 的妻子瑪麗亞·吉奧馬爾·德·皮納 (Maria Guiomar de Pina) 也來自這個社區，她與弗朗西斯科·巴雷托·德·皮納 (Francisco Barreto de Pina) 有關係，後者自 1650 年開始，在三十多年間一直是阿瑜陀耶葡萄牙人群體的領袖。⁴³ 這個社區本身也一直存續着，直到阿瑜陀耶王朝覆滅，隨着 1782 年遷都曼谷，大部分“葡萄牙人”也離開了這裡。雖然後來在曼谷也形成了同樣的聚居區，但十九世紀以

後幾乎沒有新的葡萄牙人來到這個社區，導致現在除了教堂等建築外，其他痕跡已無從探尋。不過，直到十九世紀，這裡與除印度外亞洲最大的葡萄牙人聚居地澳門一直保持着緊密的人員和物品流動，經常有新的葡萄牙人移居至此地。

結語

以上就是本文簡要探討的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長時段中，以阿瑜陀耶為據點進行的貿易。雖然十六世紀的相關史料稀缺，只能為我們提供碎片化的信息，但也揭示了以下可能性：阿瑜陀耶是在從馬六甲至中國沿海地區的廣域內從事貿易的形形色色的葡萄牙人的據點，在澳門成為商業據點之前，葡萄牙人依照慣例在這裡尋找可以搭乘前往中國沿海地區的便船。

在十七世紀，以澳門為據點的葡萄牙人在與其他勢力的競爭中，奪得了為阿瑜陀耶國王開展貿易的代理權。然而，澳門的葡萄牙人在這些競爭中並非孤軍奮戰，阿瑜陀耶的葡萄牙人社區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事件構成了阿瑜陀耶外交和海外貿易的一部分，而涉身其中的葡萄牙人和耶穌會士等群體的真實情況也在本文中得到了探討。這個時代的葡萄牙人貿易，是由從澳門前來的葡萄牙人與居住在當地的葡萄牙人相互分工、共同承擔的。本文通過對迪奧戈·佩雷拉、蘭代羅家族和阿瑜陀耶葡萄牙人聚居區等具體事例的討論，清楚展現了港口城市阿瑜陀耶在葡萄牙人亞洲貿易網絡中的重要地位。

附：本文選譯自岡美穗子的〈ポルトガル人のアジア交易ネットワークとアユタヤ〉，收入中島樂章編：《南蛮・紅毛・唐人—16・17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東京：思文閣，2013年）。

註釋：

1. Souza, George Bryan. *Survival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Subrahmanyam, Sanjay. *Improvising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ettlement in the Bay of Bengal, 1500-17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本文基於兩篇文章改寫、增補而成，即（日）岡美穗子：〈十六世紀ポルトガル人のアユタヤ＝マカオ＝九州間貿易〉，載《鉛同位体比を用いた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金属流通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新学術領域・代表者平尾良光）》成果報告書；Oka, Mihoko. "Trade Consigned to Portuguese in Ayutthaya: From the Reign of King Narai to the Reign of King Thaisa."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 vol. 56, 2011, pp. 25-41.
3. Luz, Francisco Mendes da, editor. "Livro das cidades e fortalezas que a coroa de Portugal tem nas partes da India, e das capitánias, e mais cargos que nelas há, e da importância delles." *Boletim da Biblioteca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vol. 21, 1953, pp. 1-144.
4. Pinto, Paulo Jorge de Sousa. *Portugueses e Malaio: Malaca e os Sultanatos de Johor e Achém, 1575-1619*. Sociedade Histórica da Independência de Portugal, 1997, p. 31.
5. Sousa, Lúcio de. *The Early European Presence in China, Japan, the Philippines and Southeast Asia (1555-1590): The Life of Bartolomeu Landeiro*. Macau Foundation, 2010.
6. （日）岡美穗子：《商人と宣教師——南蛮貿易の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0年，頁99-113。
7. 也稱黃銅，屬銅鉛合金，是日本傳統刀劍製作中常用的一種材料。《四庫全書·歐陽修集》裡提到“真鍮似金，真銅似銀”，說明其外觀類似黃金。——譯者註
8. （日）岡美穗子：《商人と宣教師——南蛮貿易の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0年，頁99。
9. Galvão, António. *Tratado dos Descobrimientos*. Livraria Civilização, 1987, p. 103.
10. （日）岡美穗子：《商人と宣教師——南蛮貿易の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0年，頁31-32。
11. Galvão, António. *Tratado dos Descobrimientos*. Livraria Civilização, 1987, pp. 164-165.
12. （日）高瀬弘一郎譯註：《大航海時代の日本——ポルトガル公文書に見る一》，東京：八木書店，2011年，頁202-206。
13. （葡）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岡村多希子譯：《東洋遍歷記》卷3，東京：平凡社東陽文庫，1980年，頁34。
14. （日）河野純德譯：《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全書簡》，東京：平凡社，1985年，頁439。
15. （葡）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岡村多希子譯：《東洋遍歷記》卷3，東京：平凡社東陽文庫，1980年，頁35。
16. 泰國歷朝國王名字的翻譯不一，本文均採用段立生《泰國通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8年）附錄一中的譯名。——譯者註
17. （葡）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岡村多希子譯：《東洋遍歷記》卷3，東京：平凡社東陽文庫，1980年，頁39-54。
18. （葡）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岡村多希子譯：《東洋遍歷記》卷3，東京：平凡社東陽文庫，1980年，頁70。（中文譯文引自（葡）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金國平譯：《遠遊記》，澳門：澳門基金會、澳門文化司署、東方葡萄牙學會，1999年，頁584。略有改動。——譯者註）
19. （日）岡美穗子：《商人と宣教師——南蛮貿易の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0年，頁25-61。
20. Couto, Diogo do. *Década Sexta da Ásia: dos feitos que os portugueses fizeram no descobrimento dos mares, & conquistas das terras do Oriente: em quanto governara a Índia Dom João de Castro, Gracia de Sá, Jorge Cabral, Dom Affonso de Noronha*. Vol. VII, cap. IX, Na Officina de Domingos Gonsalves, 1736, pp. 788-792.
21. 亞伯拉罕·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是出生於安特衛普的製圖師、地理學家。他於1570年出版的《寰宇大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被認為是第一部現代世界地圖集。——譯者註
22. 卡拉克帆船（carrack，西班牙語作 nao，葡萄牙語作 nau，又譯克拉克帆船、卡瑞克帆船），是十五世紀常見於地中海的一種三桅或四桅的帆船，也是歐洲史上第一種用作遠洋航行的船隻。——譯者註
23. Couto, Diogo do. *Década Sexta da Ásia*. Livro VII. Cap. XV, Na Officina de Domingos Gonsalves, 1736. pp. 788-792.
24. Loureiro, Rui Manuel. "Prisioneiros Portugueses e Justiça Chinesa."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 428.

海外文獻中的澳門史

25. *Arquivos de Macau*, vol. 3, no. 1, 1930, pp. 61–63.
26. (日) 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東京：原書房，1974年，頁478–479。
27. (葡) 路易斯·弗洛伊斯著，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譯：《日本史9（西九州編I）》，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年，頁100。
28. (日) 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東京：原書房，1974年，頁403。
29. (日) 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東京：原書房，1974年，頁504–514。
30. (日) 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東京：原書房，1974年，頁424–426。
31. Sousa, Lúcio de. *The Early European Presence in China, Japan, the Philippines and South-East Asia (1555–1590): The Life of Bartolimeu Landeiro*. Macau Foundation, 2010.
32. “Converso” 在西葡語中特指十四至十五世紀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被迫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或他們的後裔；“新基督徒”也是伊比利亞半島的歷史用語，包括“收復失地運動”（Reconquista，約718至1492年間）成功後改宗的猶太人和穆斯林，用以區別於原本信奉天主教的“舊基督徒”；“瑪拉諾”（Marrano）則是對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的蔑稱。——譯者註
33. Sousa, Lúcio de. *The Early European Presence in China, Japan, the Philippines and South-East Asia (1555–1590): The Life of Bartolimeu Landeiro*. Macau Foundation, 2010, pp. 63–74.
34. (日) 高瀨弘一郎譯註：《大航海時代の日本——ポルトガル公文書に見る一》，東京：八木書店，2011年，頁22。
35. Wicki, Joseph, editor. *Documenta Indica (1557–1580)*. Vol. XI,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1970, p. 731.
36. (日) 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東京：原書房，1974年，頁510–514。
37. (葡) 路易斯·弗洛伊斯著，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譯：《日本史10（西九州編II）》，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年，頁160。
38. (日) 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東京：原書房，1974年，頁425；(葡) 路易斯·弗洛伊斯著，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譯：《日本史10（西九州編II）》，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年，頁156。
39. (日) 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東京：原書房，1974年，頁425。
40. Sousa, Lúcio de. *The Early European Presence in China, Japan, the Philippines and South-East Asia (1555–1590): The Life of Bartolimeu Landeiro*. Macau Foundation, 2010, p. 60.
41. “Carta de Pablo Rodríguez sobre el rey de Firando.”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Filipinas 34. N. 64, 7 October 1584.
42. Bernardes de Carvalho, Rita. *La Présence Portugaise à Ayutthaya (Sinn)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2006.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MA dissertation, pp. 77–78.
43. Bernardes de Carvalho, Rita. *La Présence Portugaise à Ayutthaya (Sinn)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2006.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MA dissertation, pp. 102–103.

